

董晓萍 | 跨文化的“天鹅”：敦煌学与中国故事学

供稿 2016-08-28 邵玥

27日下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所长董晓萍教授的“跨文化民俗学”系列讲座第一讲《跨文化的“天鹅（swan maiden tale）”敦煌学与中国故事学》在北师大主楼 B700A 励耘报告厅举行。讲座由金丝燕教授主持，汪德迈先生和白乐桑教授到场聆听。

董晓萍教授首先介绍了法国汉学、日本研究与中国民俗学的“世纪相遇”。她指出，法国汉学有三大传统：从东亚国家考古开始，形成的东方学研究传统；从印度化的文化国家考察开始，形成的印欧亚历史文明比较研究传统；从沙畹（Edouard Chavannes）以来的中国华北和西北考察开始，形成的对敦煌石窟佛教文献和中国道教的研究传统。正因为有这三大传统，现代法国汉学产生了多位巨人，包括戴密微（Paul Demieville）先生及本次来参加跨文化讲座的汪德迈先生等人。当然，除了法国汉学以外，还不能忽视日本研究，上述两位学者就曾先后主持法日会馆，进行日本研究，积累了重要成果。

五四至今，海外汉学与北京高校建立了长久的联系，形成了一批特殊的早期跨文化研究遗产。对于西方学术界来说，中国始终吸引着西方，但语言和文化结构是两种文化间的主要藩篱。董教授通过中国文化史著作的年代分布于分类分布等数据，说明中国的文化史研究和教育情况，列举了梁启超、蔡元培、蒋廷黻等从事相关研究的重要学者，并以季羨林《清华园日记（1932-1934）》中记载的课程情况为例，统计清华课程中历史类课程占 27%，理论课程占 13%，专题知识性文本课程占 60%，有来自美国、英国、法国、俄国和波兰等多个国家，从事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比较文学史、历史学和海外汉学等领域的学者先后来到清华讲学。而“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开始了与法国汉学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联系。董教授指出，民俗学跨文化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口头与文献；第二，分层、进化与类型；第三，文化主体性与跨文化。

在第一部分“敦煌文献的跨文化利用”，董教授首先简要梳理了敦煌学研究的历史，并指出中国学者利用敦煌资料产生了三种研究倾向：其一是国学研究，代表人物有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其二是东方学研究，代表人物有陈寅恪、郑振铎等学者；其三是民俗学研究，以钟敬文的“天鹅处女型故事”研究为代表。

在第二部分“在跨文化语境中建立‘天鹅’故事研究个案”，董教授以钟敬文的《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研究为例，首先分析了钟敬文对敦煌石窟本《搜神记》的白话文翻译方法。钟敬文对书面文献脱文的处理方式包括删除、补文、

注释等，还尽量的保留了故事中的民俗文化知识、宗教问题等，对故事的重新分段则基于人类学、故事学等方面的考虑。从编制与研究中国故事类型的方法上看，钟敬文共收集了 25 个中国天鹅处女型故事的类型，并使用竖式编写故事类型，与使用西方 AT 分类法的横式法研究中国故事的丁乃通做法不同。此后，来自德国的学者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改造了钟敬文的竖式为横竖式，对故事的出处、母题、历史渊源等的记录也更加详细。西方学者的横式法与钟敬文的竖式法的区别在于，横式法适合表达外部多元文明的一元中心，而竖式法更适合表达一种文明内部的多元文化，研究文化内部多地区多民族故事类型，或对东方文化圈国家相似故事类型进行比较。由对故事变异的历史框架分析建立民俗学的解释有以下四种：故事叙事在时间中的变异为文献与口头两种介质所承载；对文献记载故事的脱文翻译方法不是“描”字而是要意译；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与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宗教与民俗信仰。董教授引用日本学者加藤千代对日本文化史的评论后指出，在跨文化研究上，从重视相似性到包容差异性是一种成熟。从钟敬文当年融入性学术思维、平等的概念和多元方法的研究中，可以找到跨文化研究的价值。

董教授认为应引导当代民俗学者面对若干问题：第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追求“科学”与“民主”的现代理念与搜集整理民间文学运动的关系；第二，借鉴使用“型”、“形式”、或“类型的”的术语，建立民间文学的资料系统和分析方法；第三，使用民俗学的方法，辅以历史学、语言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阐释中国文化现象；第四，在对民俗学文本的内部文化研究、外部文化研究和跨文化对话研究中形成成果；第五，将“本土化”和“跨文化”放到一个国际化平台上研究，获得理性认识与实践经验。最后，董教授以金丝燕教授文章中的一句话作为结语：跨文化学“主要研究多元文化之间的互识、互见、互动和互生共存问题，揭示文化冲突各方的接触点所在，探索各文化之间的联系、对抗、相关的交流的可能性，提升文化个体与群体的放眼能力，建立主体文化自觉与人类共享文化自觉”。

讲座结束后，金丝燕教授高度评价了董晓萍教授的讲演，认为该个案研究足够“细密”，体现了深厚的学术功力。汪德迈先生对董晓萍教授从敦煌学研究民俗学的观点与方法给予高度评价，并提出三点：一是很高兴看到中国学者对于法国汉学传统的反馈，二是对中国文献要展开多学科的研究，三是要与本国或本地学者合作研究，建立友谊。白乐桑教授也对董晓萍教授的研究方法表示赞同，双方还就一些建设性的意见进行了探索。伴随着全场学员的热烈掌声，下午的讲座圆满结束。